Modern Linguistics 现代语言学, 2026, 14(11), 80-88
Published Online November 2026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ml
https://doi.org/10.12677/ml.2026.14111050

Hans汉斯

莫言《蛙》中四字格的俄译转换机制研究

于　欢，祖拉娅提·阿马努拉*

新疆大学外国语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收稿日期：2026年10月2日；录用日期：2026年10月27日；发布日期：2026年11月6日

摘　要

汉语四字格具有结构凝练、节奏整齐和语义容量大的特点，是莫言《蛙》叙事语言和人物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汉语与俄语在词汇构成、句法组织和修辞节奏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四字格进入俄语后往往难以保持原有形式。本文以功能主义翻译理论和描写翻译研究为理论框架，并引入译者研究视角，以莫言《蛙》及伊戈尔·叶戈罗夫俄译本《Лягушки》为研究语料，在通读两部作品并结合文本检索、逐页复核的基础上，选取固定成语、习用四字短语、叠词式四字格及具有同类修辞功能的临时四字组合为代表性语料，采用文本对比、语境分析和归纳分类相结合的方法，考察其俄译转换。在与增译、减译、词性转换、拆译合译、补偿等既有翻译技巧术语展开对话的基础上，本文将《蛙》中四字格俄译概括为五种主要转换机制。总体来看，译者优先传递四字格的核心语义和语篇功能，并根据具体语境调整其句法形式、文化意象和修辞效果。研究表明，《蛙》中四字格的俄译并非四字形式的机械对应，而是其语义、句法、文化意象和修辞功能在俄语中的重新配置。这一重新配置既受目的语文学规范制约，也体现译者的主体选择，是“文本－译者－文化”互动的结果。

关键词

莫言，《蛙》，汉语四字格，汉俄翻译，转换机制

A Study on the Mechanisms of Translating Four-Character Expressions into Russian in Mo Yan’s *Frog*

Huan Yu, Zulayati Amanula*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Xinjiang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Received: October 2, 2026; accepted: October 27, 2026; published: November 6, 2026

*通讯作者。

文章引用: 于欢, 祖拉娅提·阿马努拉. 莫言《蛙》中四字格的俄译转换机制研究[J]. 现代语言学, 2026, 14(11): 80-88.
DOI: 10.12677/ml.2026.14111050

Abstract

Chinese four-character expressions are characterized by structural conciseness, rhythmic regularity, and high semantic density, and constitute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narrative language and character discourse in Mo Yan's *Frog*. Due t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Russian in lexical composition, syntactic organization, and rhetorical rhythm, these expressions often cannot retain their original forms once rendered into Russian. Taking functionalist translation theory and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s its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introducing a translator studies perspective, this paper uses Mo Yan's *Frog* and Igor Egorov's Russian translation *Лягушки* as the research corpus. On the basis of a close reading of both works, combined with text retrieval and page-by-page verification, it selects fixed idioms, conventional four-character phrases, reduplicative four-character expressions, and temporary four-character combinations with similar rhetorical functions as representative data. Adopting a method that combines textual comparison, contextual analysis, and inductive classification, it examines their Russian translation transformations. In dialogue with existing translation technique terms such as amplification, omission, conversion of parts of speech, division and combination, and compensation,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Russian translation of four-character expressions in *Frog* into five major transformation mechanisms. Overall, the translator prioritizes conveying the core semantics and discourse functions of the four-character expressions, and adjusts their syntactic forms, cultural imagery, and rhetorical effects according to the specific context.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 Russian translation of four-character expressions in *Frog* is not a mechanical correspondence of four-character forms, but a reconfiguration of their semantics, syntax, cultural imagery, and rhetorical functions in Russian. This reconfiguration is constrained by the literary norms of the target language and also reflects the translator's subjective choices; it is the result of the interaction among "text, translator, and culture".

Keywords

Mo Yan, *Frog*, Chinese Four-Character Expressions, Chinese-Russian Translation, Translation Mechanisms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与文献综述

四字格是现代汉语中辨识度较高的表达形式。它既包括意义和结构相对固定的四字成语，也包括习用短语、叠词式结构以及在具体语境中临时形成、却具有整齐节奏和整体表意功能的四音节组合。有学者指出，四字格成语具有“块状性”和“离散性”：它可以作为一个整体进入句子，又可在使用中拆分、扩展和替换[1]。这种“整体凝缩而内部可分析”的性质，决定了四字格既便于汉语叙事压缩信息，也给跨语言转换带来困难。近二十年相关成果的梳理显示，四字格外译研究长期集中于汉英方向，汉俄文学文本仍缺少基于完整作品的细读[2]。本文把四字格视为词汇选择、句法组织和修辞表达相互作用的语言单位并选取莫言长篇小说《蛙》作为语料，作品深刻剖析了以叙述人“蝌蚪”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历史洪流中卑微、尴尬、纠结与矛盾的精神世界。分析时先从《蛙》原作中筛选具体语料，再与俄译本逐项对照，考察四字格进入俄语后是否发生词类变化、成分增减、句法关系调整、信息显化以及意象替换等现象，最后依据这些实际变化归纳转换机制。《蛙》的语言在书信叙事、乡土口语和戏剧对白之间频

繁切换。四字格既参与景物描写，也表现人物身体状态、心理情绪和时代话语，还常以两个或多个单位连续出现，形成急促、夸张或庄重的节奏。就译者而言，伊戈尔•叶戈罗夫是俄罗斯汉学家、翻译家，长期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译介工作，莫言《蛙》的俄译本《Лягушки》由莫斯科 Эксмо 出版社 2020 年出版。其翻译总体倾向于在俄语文学规范内保持叙事流畅和人物口语的可读性，同时尽可能保留中国文化中的异质意象。将译者置于“文本–译者–文化”互动中考察，可以避免把翻译策略简单归因于语言差异，也能更充分地解释同一文本中不同四字格为何采用不同转换路径。

在理论框架方面，本文主要依托功能主义翻译理论和描写翻译研究。功能主义翻译理论强调翻译是一种有目的的行为，译文功能、目标读者和接受语境共同影响翻译策略；赖斯(Reiss)的文本类型理论、弗米尔(Vermeer)的目的论以及诺德(Nord)的“功能加忠诚”原则，为解释文学翻译中形式让位于功能、意象调适与修辞补偿等现象提供了基本框架。描写翻译研究则不预设唯一正确的对等模式，而关注翻译作为目的语文化事实如何形成规范。图里(Toury)的翻译规范理论、埃文–佐哈尔(Even-Zohar)的多元系统论以及切斯特曼(Chesterman)的翻译模因论，有助于把《蛙》中反复出现的四字格处理方式理解为特定历史、出版和文学系统中的描写性对象。在此基础上，本文引入译者研究视角，关注译者伊戈尔•叶戈罗夫的主体选择，使分析从单纯的文本对比转向“文本–译者–文化”三者互动的综合考察。

本文归纳的五种转换机制，与增译、减译、词性转换、拆译、合译、补偿等既有翻译技巧术语有交集，但并不满足于罗列技巧。传统术语多说明“做了什么”，本文更关心“为何这样做”以及“效果如何重建”。惯用表达对应接近套译或替代，但强调目的语中是否存在功能相近的单位。语义展开接近增译和显化，却突出汉语意合向俄语形合的转换。词类转换和句法重组继承词性转换，但更关注俄语形态和主客体视角。成组四字格的拆译合译看似是单位增减，实质是信息结构的重新划分。文化意象调适与修辞补偿则与意象替换、补偿相通，目标是修辞功能的重建。

“重新配置”不是简单改译或意译，而是原文四字格所承载的语义、句法、文化意象和修辞功能在俄语中的再分配。四字格在汉语中常以四音节整体完成信息压缩、节奏建构和语体区分；进入俄语后，这一整体可能被拆为动词谓语、副动词、形容词短语、比较结构或从句。四字边界消失后，核心语义、隐含逻辑、文化联想和修辞效果需要在俄语词汇、句法和篇章层面重新组合。它既受俄语文学规范制约，也体现译者的主动选择，因此可视为“文本–译者–文化”互动的结果。

2. 四字格的研究范围

本文对四字格作采用较宽但可检验的界定，具体包括四类：1) 固定成语，如“醍醐灌顶”“呆若木鸡”等；2) 已经习用、整体性较强的四字短语，如“才华横溢”“同病相怜”等；3) AABB 式或其他具有明显节奏特征的四字组合，如“摇摇摆摆”“浩浩荡荡”；4) 作者在语境中临时组织、但承担类似四字格修辞功能的结构，如“鹤腿猿臂”“凤眼龙睛”。偶然连续出现的四个汉字、专名、数量表达及缺乏整体语义或节奏功能的普通片段不纳入分析。

中文本采用浙江文艺出版社 2020 年版《蛙》，俄文本采用叶戈罗夫翻译、莫斯科 Эксмо 出版社 2020 年版《Лягушки》。在研究时，在通读两部作品并结合关键词检索、逐页复核的基础上，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四字格及其俄译例证，核对语义关系；最后比较原文与译文在词汇数量、词类、句法位置、意象和节奏上的变化，归纳反复出现的转换路径。分类以译文的主导变化为准。例如“醍醐灌顶、茅塞顿开”既涉及成组表达的整合，也使用了俄语惯用语，本文将其归入“惯用表达对应”，同时说明合译现象。

3. 《蛙》中四字格的语篇特征

《蛙》中的四字格具有较强的信息压缩能力。“愁容满面”“衣衫不整”分别指向人物的神态与衣

着，在较短的语言形式中完成两个描写维度的并置；“累累白骨”则将数量特征、视觉形象和评价意味集中于一个结构之中。四字格还经常以组合形式参与场景建构。描写传统接生婆时，原文连续使用“手忙脚乱、里外乱窜、大喊大叫、与产妇一样汗流浃背”，由动作、声音延伸至身体状态，形成逐层展开的描写序列，强化了场面的混乱程度和叙事节奏。在人物语言和语体组织方面，“鹤腿猿臂、凤眼龙睛”具有民间相术话语的特征，“实事求是”“有失公允”则体现较为规范的论说色彩。不同类型四字格在同一文本中的使用，构成了人物口吻与叙事语域之间的差异。叠词式四字格还承担动态描写和节奏调节功能。“摇摇摆摆”通过音节复现突出动作的反复性，“浩浩荡荡”则借助重叠形式强化规模感和持续性。由此可见，《蛙》中的四字格不仅传递概念意义，也参与信息组织、语体区分和叙事节奏的建构。结构、比较从句和完整主谓句表达相同内容，但译文长度和句法依附关系会随之变化。因此，四字格的“转换”至少涉及四个相互关联的层面：核心语义是否保留，隐含逻辑是否显化，原文单位在译句中承担何种句法功能，原有意象与节奏是否获得保存或补偿。

4. 四字格俄译的主要转换机制

通过对《蛙》汉俄文本中四字格及其对应译文的比较可以发现，译者处理四字格时并非机械复制原文形式，而是根据具体语境，对词汇、句法、语义及修辞信息进行重新配置。跨语言转换过程中，当原语结构与目的语结构存在明显差异时，译文需要在保持核心语义的基础上，根据目的语的语法特点和表达习惯对原有结构进行调整[3]。结合《蛙》中的具体语料，本文将这种调整归纳为五种主要转换机制：俄语惯用表达或单词对应、语义展开与隐含关系显化、词类转换和句法重组、成组四字格的拆译或合译、文化意象调适与修辞补偿。这五种机制并非彼此排斥。同一四字格的翻译可能同时发生词汇、句法和语义层面的变化，同一句中连续出现的多个四字格也可能分别采用不同处理方式。因此，本文以译文中最突出的变化作为分类依据，同时结合上下文考察其他伴随出现的转换现象。

4.1. 俄语惯用表达与词汇对应

汉语成语通常具有意义整体、结构相对固定和文化内涵较为丰富等特点。由于不同语言的形式和意义之间并不总能建立完全对应关系，成语翻译需要在形式保留和意义传递之间进行选择：当原语和译语在意义及表达形式上具有较高对应度时，可以直接利用目的语中已有的表达；当形式对应妨碍理解时，则应优先保证整体意义的传递[4]。

例 1：外面**白雪皑皑**。

译文：Белым-бело.

“白雪皑皑”突出大面积积雪形成的一片洁白景象。俄语 белым-бело 同样利用重复形式强化“到处一片雪白”的视觉感受。译文虽然没有复制汉语四音节结构，却仍保持了简洁和节奏鲜明的特点，因此原文的基本语义及视觉强化作用均得到较好保留。

例 2：我们也算是**同病相怜**。

译文：Настоящие товарищи по несчастью.

“同病相怜”并非强调字面意义上的“患有相同疾病”，而是表示双方具有相似的不幸经历。译文采用 товарищи по несчастью，即“患难中的伙伴”，直接传递双方因共同遭遇而产生联系的核心意义。原文中“病”的具体形象没有保留，但整体关系意义得到保存。当俄语中存在较为自然的习用搭配时，译者可以舍弃四字格的表层形式，以目的语已有表达承载其整体意义。

例 3：使我如**醍醐灌顶、茅塞顿开**。

译文：Меня точно осенило, будто завеса с глаз упала.

“醍醐灌顶”和“茅塞顿开”连续出现，共同强调人物突然领悟、思想豁然开朗的状态。译文没有分别解释两个汉语典故，而使用 меня точно осенило 表达“突然受到启发”，再以 будто завеса с глаз упала 表现“仿佛眼前的帷幕落下”。原文两个具有文化色彩的四字格由此被重新组织为俄语中两个较自然的表达。具体意象发生变化，但“由困惑到顿悟”的认知转折得到保存。

由以上例句可以看出，惯用表达或单词对应的关键并不在于保持四字格的字数和内部形式，而在于目的语是否存在能够承担相近整体意义和语用功能的语言单位。当这种对应资源存在时，译者通常优先采用较为合适的俄语表达。这一机制接近套译和替代。但从功能主义看，它并非简单放弃原文形式，而是在目的语中寻找能够承担相近整体意义和语用功能的资源。描写翻译研究则提示我们，当俄语文学翻译规范偏好自然、地道的表达时，译者会优先采用俄语惯用搭配，而非复制汉语四字结构。

4.2. 语义展开与隐含关系显化

翻译过程中，源语文本中的信息、意义、语用功能和文化因素并不一定能够在目的语中以相同形式完整重现。当目的语缺少与原语单位直接对应的表达手段时，可以借助其他词汇或语法形式补充原单位未能直接传递的信息[5]。汉语四字格具有较强的信息凝缩能力，部分动作、状态、程度以及逻辑关系可以集中于四个音节之中；进入俄语后，如果单纯使用一个词或短语无法完整承载这些信息，译者便会通过短语、动词结构甚至完整从句进行展开。

例 1：我们坐在一起**促膝倾谈**。

译文：Сидели рядом на кане и вели оживленную беседу.

“促膝倾谈”同时包含空间接近和深入交谈两层意义。“促膝”说明人物之间距离较近，“倾谈”则突出交谈行为。译文分别使用 сидели рядом на кане 和 вели оживленную беседу 表达这两个方面。原文集中在一个四字格中的空间状态和交谈行为被拆分为两个明确的俄语成分，实现了由凝缩表达向显性表达的转换。

例 2：大家都**跃跃欲试**。

译文：Загорелись желанием это осуществить.

“跃跃欲试”表达迫切希望尝试某事的心理状态，但其表层形式并未明确说明愿望所指向的具体行动。译文使用 загорелись желанием 表现“产生强烈愿望”，再以 это осуществить 明确这一愿望指向“将此事付诸实施”。原文依靠整体语感理解的行动倾向在俄语中被分解为“产生愿望 + 实施行为”，隐含关系因此得到显化。

例 3：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记忆。

译文：То, что человек меньше всего старается вспоминать.

“不堪回首”在原文中作为定语，用四个字概括人物不愿重新面对过去的心理状态。俄译没有采用一个简单形容词进行替换，而将其展开为 то, что человек меньше всего старается вспоминать，即“一个人最不愿回想的事情”。

以上例句说明，语义展开并不是简单增加译文长度，而是把原文依靠语境、整体语感或文化知识理解的信息重新安排为俄语中的显性词汇和句法关系。其核心变化可以概括为由“语义凝缩”向“关系显

化”的转换。该机制对应增译和显化。但本文强调，显化不是任意增加词汇，而是把汉语四字格依靠意合、语境和整体语感承载的隐含关系，转换为俄语中显性的词汇和句法关系。它体现了汉语语义凝缩与俄语关系显化之间的差异，也说明功能对等往往需要以形式扩展为代价。

4.3. 词类转换和句法重组

汉语四字格具有较强的句法灵活性，可以直接充当谓语、定语、状语或补语，而自身形式通常不发生明显变化。俄语则具有较丰富的形态变化，需要通过词形、格关系以及不同类型的谓语结构明确句法关系。当原文结构无法自然进入目的语句法系统时，译者需要根据目的语表达习惯对语序、句式及相关成分的语法身份进行调整[2]。因此，《蛙》中部分四字格进入俄语后不再作为一个完整语言单位存在，而被重新组织为动词、形容词、副词或副动词等句法成分。

例 1：我一定会**精神抖擞、意气风发**。

译文：Исполнюсь безграничных сил, воспряну духом.

“精神抖擞”和“意气风发”都属于状态性描写，译文没有采用两个静态形容词，而分别转换为 исполнюсь безграничных сил 和 воспряну духом 两个动词谓语。原文的精神状态由此转化为“充满力量”和“振作精神”的动态过程，使其更加自然地进入俄语谓语系统。

例 2：我对此**诚惶诚恐，心存疑惧**。

译文：Я весь трепещу, меня мучают сомнения.

“诚惶诚恐”被处理为完整的主谓结构 я весь трепещу，即“我浑身战栗”；“心存疑惧”则转化为 меня мучают сомнения，即“疑虑折磨着我”。后一结构中，汉语中的心理体验者在俄语中成为宾格 меня，而 сомнения“疑虑”成为语法主语。因此，这里的转换不仅涉及词类变化，也改变了句子的观察角度和参与者之间的句法关系。

例 3：她有些惊慌，有些**手忙脚乱**。

译文：Немного запаниковала и засуетилась.

“手忙脚乱”原本是对人物整体状态的描写，译文将其转化为动词 засуетилась，并与 запаниковала 构成并列谓语。四字格由状态性结构转化为具体动作，进入俄语动作链条。这里的形式改变主要由句法环境决定，而非单纯的词义替换。

以上例句表明，四字格进入俄语以后经常从一个相对独立的整体转化为俄语句法网络中的某一成分。词类变化、主客体重新安排以及谓语结构调整共同构成这一转换机制，其目的在于为原文意义寻找符合俄语语法习惯的承载形式。该机制更强调俄语形态变化、格关系和主客体视角。四字格进入俄语后，常从一个相对独立的整体变成俄语句法网络中的某一成分。这里的转换不仅是词类替换，更是句子观察角度和参与者关系的重新安排。

4.4. 成组四字格的拆译和合译

《蛙》中四字格经常两个或多个连续出现，通过整齐排列形成铺陈、递进或节奏强化。与单独出现的四字格相比，成组四字格的翻译不仅涉及单个单位的意义传递，还涉及各单位之间语义关系和整体节奏的重新组织。如果全部逐项对应，容易使俄语产生同义重复或过于沉重的句法结构；如果过度压缩，又可能损失原文不同单位之间的信息层次。因此，译者往往根据相邻四字格之间的语义关系重新划分翻译单位。这里的“拆译”和“合译”是本文根据《蛙》汉俄对照语料归纳出的具体转换现象。

例 1：那些接生婆们**手忙脚乱、里外乱窜、大喊大叫**，与产妇一样**汗流浃背**。

译文：Суетились, носились туда-сюда и орали благим матом, обливаясь потом.

原文连续使用四个结构，从忙乱动作、移动方向、声音一直写到身体状态，形成逐层推进的场面描写。译文分别使用 суетились、носились туда-сюда、орали благим матом 和 обливаясь потом 承接这些信息，并将其重新组织为并列谓语和副动词结构。这种处理可以概括为“拆义而不拆势”：原文整齐的四字形式被拆开，但动作和状态仍连续出现，俄语依靠动词列举、连接词以及副动词结构重新建立快速推进的节奏。因此，形式上的拆分并没有破坏原文所表现的混乱和紧张感。

例 2：他**愁容满面、衣衫不整**。

译文：Он беспокойно курит в небрежно накинутом халате.

原文两个四字格分别描写人物神态和衣着。译文没有为二者分别设置独立结构，而将“愁容满面”所表现的情绪转移到副词 беспокойно 中，将“衣衫不整”具体化为 в небрежно накинутом халате。原来的两个四字单位被重组到同一句的不同成分中，共同完成对人物烦乱状态的描写。

例 3：**五彩缤纷、奇形怪状**。

译文：Самых разных цветов и невиданных форм.

两个四字格分别从颜色和形状两个维度描写对象，彼此属于语义互补关系。译文使用 самых разных цветов 和 невиданных форм 分别保存两个观察维度，再通过 и 将二者连接。原文的四字形式被压缩为两个并列结构，但“颜色丰富 + 形态奇异”的信息关系仍然存在。

例 4：姑姑的一生……已经可以用“**波澜壮阔**”“**跌宕起伏**”等大词儿来形容了。

译文：Ее уже можно описывать такими возвышенными выражениями, как «величественная и грандиозная», «нестабильная и колеблющаяся».

译文在数量上分别为两个四字格安排了对应结构。“波澜壮阔”被译为 величественная и грандиозная，基本保存宏大、壮阔的评价意义；“跌宕起伏”则被处理为 нестабильная и колеблющаяся，意义更接近“不稳定、波动”，原文强调人生经历曲折多变的文学意味有所减弱。成组四字格即使在数量上实现逐项对应，也不能据此判断其修辞功能得到完整保存。分析成组四字格时，还需要进一步考察各单位之间原有的互补、递进或强化关系是否在译文中继续存在。

因此，成组四字格的拆译和合译实质上是对原文信息结构的重新划分。语义互补时，可以分别展开以保存不同描写维度；语义重合度较高时，则可以适当整合，避免俄语表达重复。判断其转换效果的关键不是原文与译文单位数量是否完全一致，而是整组表达的意义层次和语篇作用是否得到保存。该机制与拆译与合译、减译与增译相关，但本文所谓拆译与合译，核心不是单位数量的增减，而是原文信息结构的重新划分。语义互补时可分别展开，语义重合度高时可适当整合，语义递进时则需保留层次。判断效果的关键不是原文与译文单位数量是否一致，而是整组表达的意义层次和语篇作用是否得到保存。

4.5. 文化意象调适与修辞补偿

成语翻译并不仅涉及语言形式变化，还涉及其承载的文化信息。汉语成语中的具体形象如果能够在俄语中产生相近联想，可以通过较直接的方式加以保留；如果原语形象在目的语中缺少相应的联想基础，则可以舍弃原有形式或以目的语中功能相近的形象进行替换[4]。与此同时，翻译中的损失还可能发生在语用功能、文化因素和审美形式等层面。当某一原语单位无法在对应位置完整再现时，可以利用译文中

的其他语言手段重新创造相似效果，从而对损失的信息或修辞功能进行补偿[5]。因此，《蛙》中带有动物、典故和民间文化色彩的四字格主要表现为意象保留、意象替换以及修辞信息的分散补偿。

例 1：**鹤腿猿臂、凤眼龙睛**。

译文：Ноги журавля, руки обезьяны, глаза феникса, очи дракона.

原文连续使用“鹤、猿、凤、龙”四个动物或神话形象，具有明显的民间相术和夸张色彩。译文分别保留 журавль、обезьяна、феникс 和 дракон，将四个意象逐项再现。这里的陌生化形象本身就是人物话语风格的一部分，如果完全改换为普通俄语表达，反而可能削弱原文的民间文化色彩。因此，译者选择保留这些形象，使其继续参与人物语言风格的塑造。

例 2：众人**呆若木鸡**。

译文：Стояли, словно окаменев.

“呆若木鸡”通过“木鸡”形象表现人物因震惊而僵立不动。俄译没有保留“木鸡”，而采用 словно окаменев，即“仿佛石化”。“木鸡”和“石化”在具体形象上并不相同，但都突出人物突然失去动作、僵立不动的状态。这种处理属于以目的语中较容易理解的比喻替换原有意象，在改变形象的同时保存其主要修辞功能。

例 3：**浩浩荡荡**的大军。

俄译：Десятки тысяч лягушек накатываются валом, как войско.

“浩浩荡荡”同时包含数量众多、规模宏大和持续向前推进的动态意味。译文没有设置一个孤立词语与之对应，而是通过多个成分共同承担其修辞功能：десятки тысяч 表现数量庞大，накатываются валом 形成如浪潮涌来的动态形象，как войско 则强化军队般的规模感。原文集中于一个四字格中的信息由此分散到整个俄语译句中。这种转换没有保存“浩浩荡荡”的形式，是通过数量、动态比喻和比较结构重新建立了原文的规模感和压迫感。

文化意象调适应考察这一形象在原文中承担的具体功能。当中俄语言能够借助相似形象形成相近联想时，译者可以直接保留；当原有形象难以在俄语中自然激活相同效果时，可以利用功能相近的目的语形象进行替换；当单一词语无法承担原文全部修辞信息时，还可以将相关意义分散到译句其他位置，通过词汇、句法和修辞手段共同补偿。

综合上述语料可以发现，《蛙》中四字格的五类转换机制构成了一个由直接对应逐渐走向结构重构的过程：目的语存在自然对应资源时，采用惯用表达或单词对应；原文信息高度凝缩时，通过语义展开使隐含关系显化；原语形式无法自然适应俄语句法时，通过词类转换和句法重组重新安排语言成分；多个四字格连续出现时，根据彼此之间的语义关系进行拆译或合译；原有文化意象和修辞形式难以直接保存时，则通过意象保留、替换或修辞补偿重新建立相应功能。由此可见，四字格俄译的核心并不是复制“四字”形式，而是在俄语中重新配置原文的核心语义、句法关系、文化意象和修辞功能。该机制与意象替换和补偿直接相关。功能主义视角下，文化意象是否保留，取决于其在原文中承担的功能以及目的语读者能否激活相近联想；描写翻译研究则关注译入语文化规范对意象处理的制约。本文进一步指出，当单一词语无法承担原文全部修辞信息时，译者可将相关意义分散到译句其他位置，通过词汇、句法和修辞手段共同补偿，实现功能重建。

5. 结语

通过对莫言《蛙》及叶戈罗夫俄译本中四字格的对比分析可以发现，四字格的俄译并不存在固定的

一一对应模式。本文归纳出的五类主要转换机制：俄语惯用表达与词汇对应、语义展开与隐含关系显化、词类转换和句法重组、成组四字格的拆译或合译、文化意象调适与修辞补偿。他们反映了四字格由汉语进入俄语后在词汇、句法和修辞层面的不同变化。这些机制并非彼此独立，同一四字格在具体翻译过程中可能同时发生语义展开、结构调整和意象转换，其具体形式取决于原文四字格的语义特点及其所在的句法和语篇环境。

从理论上看，本文首先将四字格俄译从传统技巧罗列推进到功能主义与描写翻译研究框架中，说明增译、减译、词性转换、拆译合译、补偿等术语在文学翻译中如何被功能驱动和语境制约。其次，通过引入译者研究，把翻译策略与叶戈罗夫的主体选择、俄语文学规范和出版社语境联系起来，使研究从文本对比转向“文本－译者－文化”互动。最后，深化重新配置概念，将其界定为原文四字格在语义、句法、文化意象和修辞功能四个层面的俄语再分配。

由此可以认为，《蛙》中四字格俄译的核心不是寻找形式完全对应的俄语单位，而是对原文高度凝缩的信息进行重新配置。当俄语具有较自然的对应资源时，译文可以保持较高程度的词汇和意象对应；当两种语言在表达方式上存在差异时，原文四字格所承载的信息则被重新分配到俄语的词汇、句法和修辞结构之中。四字格由汉语到俄语的转换因而表现为一个由直接对应到结构重组、由形式保留到功能重建的连续过程，这也是《蛙》中四字格俄译最主要的整体特征。就译者而言，叶戈罗夫的选择既受俄语语言规范制约，也体现其作为文学翻译者的主体性；就文化而言，四字格俄译是汉语文学形式进入俄语文学系统后的功能再造。

参考文献

[1] 王文斌, 高静. 论汉语四字格成语的块状性和离散性[J].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9, 41(2): 3-20.

[2] 赵欣. 近二十年汉语四字格翻译研究概览[J]. 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 2019(4): 64-69.

[3] 吕雪娇, 赵建国. 现代汉语被动句式的维译转换机制研究——以巴金《家》汉维译本为例[J]. 现代语言学, 2026, 14(9): 404-410.

[4] 赵紫玉, 祖拉娅提·阿马努拉. 浅析交际翻译理论视角下成语俄译[J]. 现代语言学, 2024, 12(8): 185-189.

[5] 詹艾玥. 翻译补偿视角下《骆驼祥子》俄译本的北京方言翻译[J]. 现代语言学, 2024, 12(12): 367-373.